

再现传统中国的思想

黄进兴 著

理学家的道德观 儒教的反思 文学的真实 与 历史的真实

史学家黄进兴

中国哲学史、思想史专题文集。

全球化趋势下，西方思想汹涌而来，

迎新与纳旧，必须与时俱进。

广东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再现传统中国的思想 / 黄进兴著. —广州: 广东人民出版社, 2020. 3
ISBN 978-7-218-14199-2


I. ①再… II. ①黄… III. ①思想史—中国—文集 IV. ①B2-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20) 第 024331 号

ZAIXIAN CHUANTONG ZHONGGUO DE SIXIANG

再现传统中国的思想

黄进兴 著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出版人: 肖风华

丛书策划: 李怀宇

责任编辑: 李展鹏

装帧设计: 张绮华

责任技编: 周杰 周星奎

出版发行: 广东人民出版社

地 址: 广州市海珠区新港西路 204 号 2 号楼 (邮政编码 510300)

电 话: (020) 85716809 (总编室)

传 真: (020) 85716872

网 址: <http://www.gdpph.com>

印 刷: 恒美印务 (广州) 有限公司

开 本: 889mm × 1194mm 1/32

印 张: 9.875 字 数: 230 千

版 次: 2020 年 3 月第 1 版

印 次: 2020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59.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 请与出版社 (020-85716848) 联系调换。

售书热线: (020) 85716826

自序

20世纪80年代甫归国，某日受大学之邀做了一个讲演，大约是攸关“朱陆异同”的陈年老题目。因为受了英国哲学家柯灵乌（R. G. Collingwood, 1889—1943）分析形上学（*metaphysics*）的启示，我尝试着用解析“绝对预设”（*absolute pre-suppositions*）的技巧^①去厘清两位南宋理学家——朱熹（1130—1200）和陆象山（1139—1193）思想歧异的底蕴。其知识背景当然是鉴于该时某些哲学史工作者总是摆脱不了固有宗派意识的作用，依旧沉溺于道统党同伐异的习性，故希冀个人能另辟蹊径，开拓出一条新路。当然，抚今追昔显然毫不起作用，无奈只是踽踽独行而已。

但是那回讲演，因缘有位听众提问谓：你的分析还不错，但是洋味略重，中国的哲学能否只用本土的概念去阐释？当时我一愣，虽然答了“方法无分中西，只要合宜即行”，可是从此内心却时时徘徊那位先生的提问达数十年之久。直至2014年，我偶读了法籍哲学史名家哈铎（*Pierre Hadot*, 1922—

^① R. G. Collingwood, *Essay on Metaphysics* (Chicago: Henry Regnery Company, 1972), Chs. IV and V.

2010) 的两部英译作品^①方才恍然大悟症结所在。原来中国古典哲学如同西方上古思想一般，均着重在实践，而非言辞辩难，故并非只是重构“论证”即可了事。若是，恰似买椟还珠，本末倒置。

其实，自清末以来西方思想即从四面八方，排山倒海涌进中国。各方反应遂亦不一，其授受的光谱竟有两极：有全盘排斥者，有欣然接受者，二者究竟皆非中庸开通之道。众人之中，个人认为最稳健而中肯者无过于王国维（1877—1927）。他主张：

今之言学者，有新旧之争，有中西之争，有有用之学与无用之学之争。余正告天下曰：学无新旧也，无中西也，无有用无用也。^②

类此膛腑开阔、百川纳海的胸怀，实不多见。无怪王氏的学问在民初成就最大，境界最高，得居“清华四大导师”之冠。

今哲人已远，典型仍在夙昔，个人平日学习，亦不忘秉持相同的信念，时时鞭策、警惕自己。故拙作所有的文本，无论早发或晚出，题旨虽然有异，惟无不出于同样的旨趣：迎新与纳旧，必须与时俱进。

未了，我必得向老友李怀宇先生致谢，承他热心地牵成，

^① Pierre Hadot, *Philosophy as a Way of Life: Spiritual Exercises from Socrates to Foucault*, edited with an introduction by Arnold I. Davidson, trans. Michael Chase (Malden, Mass.: Blackwell Publishing Ltd., 1995); *What Is Ancient Philosophy?* trans. Michael Chase (Cambridge, Mass.: The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2).

^② 王国维，《国学丛刊序》（1911），谢维扬、房鑫亮编，《王国维全集》（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2009），卷十四，页129。

拙作方得为广东人民出版社所接纳与刊行。常语有云 “为学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 良哉斯言！拙作的缺陷与不足之处必然甚多，故尚祈海内外博雅君子，不吝时时予以指正。

黄进兴谨志

2019 年

目 录

机构的宣言

——重读傅斯年的《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 1

所谓“道德自主性”

——以西方观念解释中国思想之限制的例证 28

再现传统中国的思想

——迈向论述化、命题化的哲学? 54

反思“中国哲学合法性”的论辩

——一个虚构的“假议题”(pseudo-problem)? 64

论儒教的俗世性格

——从李绂的《原教》谈起 75

理学家的道德观

——以《大学》、《近思录》与《传习录》为例证 101

清末民初道德意识转化的几点观察 144

“书中有书”

——《从理学到伦理学》后记 188

象征的扩张

——孔庙祀典与帝国礼制 196

孔庙的解构与重组	
——转化传统文化所衍生的困境	243
研究儒教的反思	
——作为儒教圣域时的孔庙	258
文学的真实与历史的真实	
——王冕之死	282
以序为书	
——评介《朱熹的历史世界》	290
附录一 找到史家的恰当位置	
——黄进兴的当代史学之旅	297
附录二 “当代史学的进行式”系列摘编	303

机构的宣言

——重读傅斯年的《历史语言研究所 工作之旨趣》

若要标举中国近代史学的里程碑，有两篇大块文章绝不可忽略：其一是1902年梁启超（1873—1929）所发表的《新史学》^①；另一则是1928年傅斯年（1896—1950）刊行的《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②。前篇系开风气之先，后篇则是机构的宣言；两者影响日后中国史学的发展，既深且远。之前，个人对梁氏《新史学》业略有抒发，于此不再赘言。^③以下则拟语境化（contextualize）傅斯年的《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希冀能彰显该文划时代的学术意涵。

① 梁启超，《新史学》，《饮冰室文集》（台北：台湾中华书局，1960），第二册，“文集之九”，页1—32。

② 傅斯年，《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傅孟真先生遗著编辑委员会编，《傅斯年全集》（台北：联经出版公司，1980），第四册，页253—266。

③ 黄进兴，《中国近代史学的双重危机：试论“新史学”的诞生及其所面临的困境》，氏著，《后现代主义与史学研究》（台北：三民书局，2006；北京：三联书店，2008），附录，三民版页229—267，三联版页217—255。

傅斯年在北京大学甫完成学业后，考取官费留学，于1919年冬便径赴英国深造；然而这段时期，他投入实验心理学与其他自然学科的修习，与史学研究的关系并不显豁。但1923年秋，他由英国转至德国进修，则深受德国学术氛围的影响，受到比较语言学与历史语言学的熏染，遂奠定他对史学的理解。1926年他从德国返国，不到两年便受命筹备“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并发表《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该文不啻为设立“史语所”的宣言，并引领了下一世代的学风。

世纪之际，欧洲学风已有相当大的变化（包括德国），但傅斯年留德期间对当时德国史学界的认知，似犹被笼罩在19世纪历史学派之下。该时对“语言学”（philology）和“档案”（archives）的重视，^①依旧主导了史学研究，而学界较无感于新兴“社会科学”对传统史学的冲击，这与20世纪初期的德国历史学的特征是一致的。^②

傅斯年向来厌恶马克思主义，因此鄙视唯物史观，连带对

① 傅斯年当年称之为“语言学”（philology），今则译为“语文学”，而与今之“语言学”（linguistics）有所区别。概言之，“语文学”的对象系文字书写，“语言学”则是言说口语。较详细的讨论则参阅Ku-ming Kevin Chang, “Philology or Linguistics? Transcontinental Responses”, in *World Philology*, ed. Sheldon Pollock, Benjamin A. Elman and Ku-ming Kevin Chang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15), pp. 311–331.

② cf. Fritz Ringer, *Max Weber's Methodology: The Unification of the Cultural and Social Sciences*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7), pp. 8–35.

方兴未艾的社会科学于史学的冲击，难免较为低估。^①其时他对“社会科学”的认识，似犹停留在“辅助科学”（auxiliary sciences）的工具层面，尚未察觉“社会科学”无论在理论还是方法方面，均将掀起惊涛骇浪。^②试对照当时中国史学的动态，另一股企图结合社会科学的史学业已隐然成形，不容忽视；例如，何炳松（1890—1946）于1924年移译了鲁宾逊（James Harvey Robinson, 1863—1936）的《新史学》（*New History*），该书极力鼓吹史学与社会科学结盟，主张“历史能否进步，能否有用，完全看历史能否与他种科学联合，不去仇视它们”^③。该书风行一时，甚受学界欢迎。^④不止于此，原为中国

① 举其例：他的晚年定论可见于《“国立台湾大学”法学院〈社会科学论丛〉发刊词》（1950），《傅斯年全集》第四册，页362—365。马克思主义一般被视作社会科学的分支或特殊形态。傅氏发表《旨趣》不久，即发生“中国社会史论战”，围绕唯物史观而发，多方针锋相对。遑论之后，社会科学对史学的冲击。请参阅拙文《历史的转向》，《文化中国》44（2016）：1—10。

② “辅助科学”（auxiliary sciences）乃是传统史学治史的辅助工具，例如钱币学、训诂学、版本学等等。“辅助科学”与“社会科学”之基本差别是：前者为史学之工具，帮助辨伪、考订与解读文献；后者则提供史学解释的理论和方法。

③ 鲁宾逊的《新史学》发表于1912年，其在美国的社会与学术意义可参阅Richard Hofstadter, *The Progressive Historians* (New York: Vintage Book, 1970)的相关章节。何炳松受朱希祖之托，将所授课程之英文教本译为中文。何炳松译，《新史学》（上海：商务印书馆，1924），页151。

④ 李孝迁，《西方史学在中国的传播（1882—1949）》（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第五章“鲁宾逊新史学派在中国的回响”，页192—239。

“新史学”发声者的梁启超，继其扛鼎之作《中国历史研究法》（1922）之后，于1926年复刊行了《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也坦承“史学，若严格的分类，应是社会科学的一种”^①。尤有进之，企图结合社会科学的想法，并非流于空谈，视该时主流大学的史学教育学制的更革，均能见其斧凿之痕。例如：1920年起，北京大学史学系即明定“社会科学，为史学基本知识，列于必修科”^②。其劲敌清华大学也不遑多让。^③

要之，傅斯年所标举的“历史语言”研究的进路，与主张和社会科学结盟的史学，适代表当时两种截然有异、相互抗衡的史学流派。按日耳曼的历史学派专擅“语言学”，傅斯年深悉个中三昧：于公，他立意将“语言”二字镶嵌入甫创立的机构名称——“历史语言研究所”（英文名称则为“*Institute of History and Philology*”）；于个人实践，他日后几篇中国上古史的开创性研究，均与此息息相关。例如：令他声名大噪的《性命古训辨证》^④、《夷夏东西说》^⑤诸篇。要言之，“语言学”乃是傅氏治史的利器，其影响绝不止于工具而已；无论在研究进

① 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饮冰室专集》（台北：台湾中华书局，1972），第一册，页151。

② 朱希祖，《北京大学史学系过去之略史与将来之希望》，《北京大学卅一周年纪念刊》（国立北京大学卅一周年纪念会宣传股编印，1929），页70—71。又见其为何炳松所译，《新史学序》，《新史学》，页1—2。

③ 清华大学历史系编，《文献与记忆中的清华历史系（1926—1952）》（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16），页6。

④ 傅斯年，《性命古训辨证》，《傅斯年全集》第二册，页161—404。

⑤ 傅斯年，《夷夏东西说》，《傅斯年全集》第三册，页86—157。

路还是学术命题，它均发挥了关键性的作用。晚近，我的同事张谷铭博士对德国“语言学”（philology，或译“语文学”）与傅斯年史学的形成，有甚为精辟的阐述。^①拙文则拟萃取傅氏大文的主要论旨，稍加铺陈，俾便掌握其来龙去脉。

简之，《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毫无疑问系傅氏一生治学的纲领，也是傅氏史学最完整的陈述。而最为时人及后代所津津乐道的便是“历史学只是史料学”此一响亮的口号，其功过是非总缘此一命题而发。可是要理解此一论点，则必须先掌握傅氏对史学的定位，以及所赋予的任务。以次，方及他所引进的“史料”的新概念。傅氏的史学与兰克学派的关系断不能机械性地看待，否则恰如禅宗所云“死在字下。”要之，兰克（Leopold von Ranke，1795—1886）的史学在世纪之际的德国乃至欧洲，面临强敌环伺、四面楚歌的窘况；但若干治史的精神，尤其对不同文化的外来人却仍是新颖可喜，而为傅氏所摄取或继承。

首先，《旨趣》一文，傅氏开宗明义便反对“著史”，因为著史每多多少少带点古世、中世的意味，且每取伦理手段，

^① 张谷铭，《Philology 与史语所：陈寅恪、傅斯年与中国的“东方学”》，《“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87. 2（2016）：375—460。另外，王汎森傅斯年传记，迄今仍是傅氏学思最为生动翔实的力作，甚值得参考。见 Fan-sen Wang, *Fu Ssu-nien: A Life in Chinese History and Politic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0)；中译本为王晓冰译，《傅斯年：中国近代历史与政治中的个体生命》（北京：三联书店，2012）。

作文章家的本事。^①傅氏立意打破中国春秋笔法和文史合一的传统，于此表露无遗。他反对“疏通”，认为只要把材料整理好，则事实自然显明了。依此，外加的“见解”或多余的“推论”，皆不可取，甚至是“危险的事”。^②

在他的授课讲义《史学方法导论》里，傅氏犹一再提示直接史料与间接史料的不同价值。以致民初学人之间，他格外推崇王国维（1877—1927）和陈寅恪（1890—1969），其故皆因二位懂得运用中、外直接史料，创造出辉煌的成果。^③

其实只要稍加比对兰克的论点，傅氏的史学源头就豁然开朗。兰克的《1494年至1514年拉丁与日耳曼民族史》（*Histories of the Latin and Germanic Nations, 1494 - 1514*），向来被公认为西方近代史学的里程碑，它的序言学界尤耳熟能详。兰克说道：

历史曾经被赋予判断过去，指导现在，以为未来谋福的职责。本书不希望有如许的需求，它仅是陈述真正发生的事实而已。^④

兰克呼吁历史仅是“陈述真正发生的事实”（*wie es eigentlich gewesen*），初闻之下语调似极谦卑，实则不然。这句话正是近

① 傅斯年，《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傅斯年全集》第四册，页253。

② 傅斯年，《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傅斯年全集》第四册，页262。

③ 傅斯年，《史学方法导论》，《傅斯年全集》第二册，页7—23。

④ *The Theory and Practice of History: Leopold von Ranke*, ed. Georg G. Iggers and Konrad von Moltke (Indianapolis: Bobbs-Merrill, 1973), p. 137.

代史学的精神标志，它象征历史的独立宣言，史学从此无复是神学、哲学的奴婢，亦非文学、艺术的附庸。

对兰克而言，平铺直叙地呈现史实，纵使感到抑制与无趣，仍然是史学的至高法则。所以舞文弄墨，并非史家分内之事。兰克自许己身的著作咸得自辛勤爬梳的原始资料，果非万不得已，绝不假手间接史料；得以符合如此严苛的史料纪律，他感到万分的自豪。^①

而“史实自明”同为傅斯年反对“疏通”的理据。傅氏坚信：

史学的对象是史料，不是文词，不是伦理，不是神学，并且不是社会学。史学的工作是整理史料，不是作艺术的建设，不是做疏通的事业，不是去扶持或推倒这个运动，或那个主义。^②

若稍加推敲这些学科排名顺序的底蕴，并不难察觉傅氏思路所反映的竟是西方史学演变的缩影。他避而不提传统旧学中压制史学的“经学”，反倒突显西方文化独特的产物——“神学”与“社会学”，就是极可玩味的线索。^③这些学科均曾在历史的

① *The Theory and Practice of History: Leopold von Ranke*, pp. 137 - 138.

② 傅斯年，《史学方法导论》，《傅斯年全集》第二册，页5。

③ “神学”主导西洋中古史学。“文词”、“伦理”向来是西方上古史学至18世纪启蒙史学所牵涉的面相。“社会学”则是因19世纪法国孔德（Auguste Comte, 1798—1857）建立之后，将史学附属其下。*Auguste Comte and Positivism: The Essential Writings*, ed. Gertrud Lenzer (New York: Harper & Row, 1975), pp. 66, 91 - 92, 247 - 261.

园地留下喧宾夺主的纪录，所以傅氏重申史料方是历史的主体，只要整理好史料，事实就显豁了。

若依兰克之见，欲达成上述的目标，历史则必得植基于原始资料，而非如传统史家以文采为高，辗转抄袭，以讹传讹。按，兰克固然受后世封作“科学史学的始祖”（the founder or father of scientific history），但他的文采与叙事风格，生前身后均备受称颂的事实，却往往不受重视。要之，他的史著不止受到标榜“文史合一”的麦考雷（Thomas Babington Macaulay, 1800—1859）极大的赞扬^①稍后的狄尔泰（Wilhelm Dilthey, 1833—1911）甚至将兰克与修斯狄士（Thucydides, 460 BC—400 BC）、古佐亚地尼（Francesco Guicciardini, 1483—1540）、吉朋（Edward Gibbon, 1737—1794）、麦考雷列为同一等级的叙事天才。^②可见作为近代史学的肇基者，兰克深刻动人的文笔并非传承所在；反而拟似科学而严谨的史料批评，方被视为正传。^③兰克要求自己的著作需得自原始资料，果非万不得已，绝不假手间接史料。他借自己的作品《宗教改革时期的日耳曼

① 举其例：麦考雷对兰克的名著《教皇史》（*Histoire des Papes*）称颂备至。参阅 Thomas Babington Macaulay, *Critical and Miscellaneous Essays* (New York: D. Appleton and Company, 1895), vol. III, pp. 303—340。

② Wilhelm Dilthey, *Selected Writings*, ed. and trans. H. P. Rickma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6), p. 188.

③ Lord Acton, *Essays in the Study and Writing of History* (Indianapolis: Liberty Classics, 1985), pp. 331—332; G. P. Gooch, *History and Historians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 (Boston: Beacon Press, 1968), p. 97.

史》（*Deutsche Geschichte im Zeitalter der Reformation*）现身说法道：

我见到这个时代的来临，吾人不复将近代史（modern history）建立在间接的报导之上，甚而同时代的史家除非拥有一手的知识，亦不予采信。我们宁可把史学从目击的叙述与最真实及直接的史源中建立起来。^①

要之，兰克并非首创应用原始资料的史家，但是他却是第一个将此一原则引领至近代史研究的领域。于此，兰克心目中的“近代史”必须稍行批注，方能识其大义。盖 15、16 世纪以降，欧洲各国所积存的外交档案，于 19 世纪渐次开放，兰克适逢其会，善加运用，成果斐然；这段历史材料的优势，实上古史与中古史难以望其项背的，以致兰克的成就以近代政治外交史最为耀眼。

终其一生，兰克风尘仆仆地至欧洲各处，辛勤寻找、爬梳原始的档案，他所构作的史著无非是己身治史理念最佳的实践。^②他的治学风格诚如下一世纪中国的追随者——傅斯年所自勉的：

我们不是读书人，我们只是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

① Leopold von Ranke, *History of the Reformation in Germany*, trans. Sarah Austin (London: George Routledge and Sons, Limited, 1905), p. xi.

② 参阅 Gino Benzoni, “Ranke’s Favorite Source” 与 Ugo Tucci, “Ranke and the Venetian Document Market”, 均收入 *Leopold von Ranke and the Shaping of the Historical Discipline*, ed. Georg G. Iggers and James M. Powell (Syracuse: Syracuse University Press, 1990), chs. 4&9.

脚找东西! ①

傅氏亟于找寻的“东西”就是“新材料”，居中特以直接史料为高。迥异于传统静坐书斋的文士，傅氏为中国史家塑模动态的新形象，无非远绍西方的兰克。

这种对原始资料的要求，在西方亦迟迄近代方成为史学操作的普遍原则。②而该时西方史学方法的巨著，亦将上述的观点融入其中。③例如：法人朗格诺瓦（Charles V. Langlois，

① 傅斯年，《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傅斯年全集》第四册，页264。虽然我揣测傅斯年所塑立的新史家形象取自兰克的治学特征，但此一句话似由英国史家崔威廉（George Macaulay Trevelyan，1876—1962）转手而来。崔威廉于1903年发表《重新发现克里欧》（注：克里欧[Clio]为历史女神），旨在驳斥另一位史家伯雷（J. B. Bury，1861—1927）科学史学之说。1913年崔氏修订后复收入《克里欧：一位女神》。该文形容敌对的学派“Collect the ‘facts’ ... you must go down to Hell and up to Heaven to fetch them”。参较 George Macaulay Trevelyan, “Clio Rediscovered”, in *The Varieties of History*, ed. Fritz Stern (Cleveland: Meridian Books, 1957), p. 232。傅斯年所形塑的史家具有搜寻资料的动态观念，此与囿于饱读经史的传统学者有所区别。

② Arnaldo Momigliano, “Ancient History and the Antiquarian”, in his *Studies in Historiography* (New York: Harper & Row, 1966), pp. 1-39.

③ 19、20世纪之交，西方广受欢迎且最具分量的两本史学方法巨著，其一为德国史家伯伦汉（Ernst Bernheim，1850—1942）于1889年发表的《历史方法论与历史哲学》（*Lehrbuch der Historischen Methode und der Geschichtsphilosophie*）（今名），其二为法国史家朗格诺瓦及赛格诺博于1897年合著刊行的《史学原论》。二书一方面绍述兰克史学，另一方面有所订补，但于此二原则仍深信不疑。这只要稍稍检视它们在“史料征辨”所费的巨大篇幅即可得知。